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〇九期 ——  
(二〇〇九年七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907b)

【峥嵘岁月】	女政治犯王容芬	戴 晴·洛 恪
【人物春秋】	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陈冀德
【往事追忆】	批邓和“四·五”事件	戴维堤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峥嵘岁月】

女政治犯王容芬

• 戴 晴·洛 恪 •

有着明确的惩办反革命罪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第一章》是一九七九年颁布的（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在这之前，如果不考虑种种临时的规定，比如《公安六条》等等，对“反革命”的判罪的依据就是一九五一年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办反革命条例》了。此条例没有细目，统而言之为：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以本条例判罪。”

考虑到汉语象形文字转意上的随意性及单音节字自由运用的特色“破坏”与“推翻”所能涵蕴的定罪面就很难说了——当然这是个语义学界绝对争不出个所以然的问题，好在自《条例》公布以来的案例尚存，只消作一点属于算术式的分析，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刑法·第一章》，它下领十三条款，规定得明白多了。

将近十年了。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一九七六年清明的大逮捕之后，如果西单民主墙算一次、卖情报给台湾的那两个半人算一次，一九八五年秋天北大学生与警察有了一点小磨擦之后抓的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也算一次的话，十年间，尚不见出现过轰动社会的政治犯案。

几乎没有政治犯的十年，在中国，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大概是头一回。如果联想到中国的当权者这百年来对有着不同思想与政治信念的人之残忍与恣意，这十年，竟是平安得可以载入史册了。

政治犯案在中国，与它的文明同样久远。

如果把鲧算作“渎职”的话，最早的载入史册的政治犯，恐怕就是商汤了。“不多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先是把“修德”的汤“召而囚之夏台”，后来掉以轻心，放了。汤东山再起。“率兵以伐夏桀”，弃甲曳兵的桀后悔不迭——“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里的“修德”与否当然是后人的评价，因为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全体民众必须共同遵守的标准。

不但奴隶制的时候，就是到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朕即法”，对政治犯的判断也只有一条：“忠”或“不忠”。有名的酷吏如郅都、杜周等，亢直也好、从谏也好，甚至暴挫擅磔、酷比蝮螫，指的其实是他们的手段，并非量刑的标准。著名法家韩非虽然废了贵族的世袭分封，主张无论干部还是军官，都要自基层一级级选拔上来，最基本的政治标准仍是“上之所是，人皆是之；上之所非，人皆非之”；直到公车上书，讲的还是治民之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未动摇，人权的观念尚未萌生，政治犯的标准仍然只有一个——犯上。

辛亥之后，民国诞生，《暂行新刑律》不再提“上”，只提“国”。对政治犯罪有了新的规定：内乱、外患、泄露机务；处罚是：徒刑、流刑、遣返；有死刑，但交一笔款即可了事的也有。

对李大钊的审判开始时是合于法律程序的：组成合议庭，并据他“崇信并宣传共产主义”，论以煽惑罪，顶多内乱罪。但“献上”之后，“斥之为失，出，悉改科死刑。”杀与不杀，还是张大帅说了算——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别说懂法，连字都不识几个。

李大钊等人从容就义之后十个月，《中华民国刑法》颁布了。

随着日寇的进犯，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少，恰如食物与燃料。《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与《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七年颁布，规定“凡是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式宣传抗日、举行游行等，视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破坏交通，军警得立即逮捕，并得搜捕嫌疑犯。”

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几大政治犯案，依据的全是这套条文。到了一九四七年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匆匆颁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刑罚最严厉的一部，死刑的范围极大。不过话说回来，权贵们何苦费这套文字功夫呢？宋教仁、廖仲凯、史量才、李公仆、闻一多，不都是从暗处噼叭放几枪就解决了吗？

志士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每一页，妇女们毫无例外。请看下表：

时代	姓名	生年	卒年	卒时年龄	罪名	处决方式
清末	秋瑾	1876	1907	31岁	暴乱	暴尸道路
大革命	陈铁军	1904	1928	24岁	异党	枪决
土地革命	杨开慧	1901	1930	29岁	最严重政治犯	示众枪决
抗日战争	赵一曼	1905	1936	31岁	战俘	枪决
解放战争	江竹筠	1920	1949	29岁	异党	秘密枪杀
人民共和国	张志新	1930	1975	45岁	现行反革命	禁声枪决（枪决前，

以细铁丝勒住下腭，使犯人发不出声音。)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她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不曾将自己的聪慧与果敢仅仅局限在教育、保健、福利等“合于妇德”的有数领域。为寻求更加光明与合理的社会，她们不曾因自己身体的柔弱与环绕膝下的娇儿有过片刻的犹豫；当权者当然也不曾因这同一理由而对她们施予稍多一点的仁慈。

她们的牺牲都很英勇。而且，都那么年轻。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系列学术讲座上。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学生的和学者们的心都活泛起来，恰如未名湖那一泓绿水。

她讲的题目是“马克斯·韦伯与当今世界”，谁都知道这是个难啃的大块头，恐怕德国人自己都这么想。但她讲得挺漂亮，几句听下来就知道这是个读书而不读死书的人。她用典不少，但并未预先写在纸上，全是讲到兴头的时候随便拉来的。有些见解相当独特，起码除她之外，我还没在别的书上看到过。

北大学生对演讲人之不客气是出了名的，稍觉厌烦，便是一片离席的噼叭声。她语调平平，几乎没有手势，却稳住了那么一大屋子人，包括走廊上和窗台上。

我上前搭话。她很矜持。我称赞她的裙衣漂亮，想借此缓和局面，也收效不大。但她答应了接受采访（即光明日报的《学者答问录》），对我的稿子也十分客气地几乎一字未动。我想，或许她是因为大报将她一下子奉为学者而稍稍受了点惊吓吧？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四十岁还不到——我以为她至少五十岁了——而且坐过十三年牢。

按照中国二十多年前通行的政治用语，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亲四十年代开了个干鲜果品店，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母亲接手经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交出店铺。当了国家职工（售货员，月薪人民币十三元），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着。现在，老太太每月还到“单位”领退休金，但股息是绝对不碰的——她以为这样那帽子就与她无干了。

每月十三元钱养活三口人，王容芬小时候过的是苦孩子的日子。但她的“现反”不是出于对这一政权的仇视，反倒是挚爱，爱到非要用她一茎小草般的生命去改变她认为的“全民族错误的运转”不可。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用理想与信仰来造就差不多五代人（其中包括一九一〇至一九五〇年出生的三代青年）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王容芬这样的“犯人”，一九六六年以来曾出现过一大批。以他们的死为世人所知的并不多：遇罗克、张志新、王申西等等。他们都不是政治家，不但缺乏组织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政治见解也浅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那么简单，读的书那么有限，能发表出什么政见呢？但这批人大都不怎么怕死，对常人孜孜以求的名利、安乐看得很淡。他们奉为神圣的，为之可捐弃一切的，是心中的信条。

释放之后，王容芬曾到西德研究讲学。她差一点就见到了 Johanner Wlkelmau，一位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终生默默收集整理韦伯文稿的老学者。她讲到这里十分动情，听讲的学生们直到一年以后还背得出她的原话。在西德，东道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她名字前边冠上了与她的研究相应的某种称谓。等她知道我准备把这头衔也介绍给读者的时候，急忙来信，请“千万千万”抹去。显然，没过多久，就有闲话传来（甚至过了很久还有）——“她算什么学者？！怎么找上的？！哼，她还曾……”

是的，她还曾——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〇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象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就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糊，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我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争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卷进宫德林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拄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搞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讲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象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

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

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铐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象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

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话，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万岁万岁 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

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设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番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象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锯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



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功文明史……”有问题吗？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徒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

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要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大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毒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杆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晃旮，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

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酉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黑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

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宣读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干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嘟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嘟，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 摘自《京客报告》

~~~~~

### 【人物春秋】

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 陈冀德 •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姚文元了。与北京的李希凡相对应，人称“南姚北李”，是文艺理论方面崭露头角的新人。

认识姚文元，则是在五九年底，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上。我和戴厚英等一批来自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是在会议中间参加进去的。会议以批判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创导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为题目，针对的，却是国内文艺理论界。因为，他们张扬人道主义、人性论，从舆论上影响了，乃至妨碍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贯彻。

起初，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院校中文系的老师们、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们。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并且，继续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奉之为当时文艺理论领域的经典。批判会自然开不下去了。于是，有关方面和会议的主持方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从本市的三所高校中文系，调集了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会议。与老师们、编辑们唱起了对台戏。

在这个批判会上，我认识了姚文元。当时，姚文元是作协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轮流主持会议。但姚文元似乎从未主持过会议，也很少在会上露脸。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书记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

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噤着，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把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憨厚中带着窝囊。

姚文元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是在我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室工作之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大部分回学校去了。复旦、师大、师院三所院校的中文系，各有两名学生被留了下来。作为大学毕业生，正式分配到作协机关下属的文学研究室工作。我和戴厚英都在其中。我们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专业，但在文艺评论上总归是新手。因此，作协党组安排了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凡是我们写的文章，照例，必须先交给指导老师看过。同意后，方能拿出去发表。姚文元被指定是我的指导老师。姚文元虽然也是作协党组成员，却从不见他坐班。连他的人都极少照面。只是在我刚分配到文学研究室工作时，辅导我写过一篇小杂文。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他也许从来就没有认我这个门生。

但在我来说，不管怎么样，一朝为师，终身是师。人间尚有“一字”师，我就曾有过这么一位“一文”师。我曾因工作需要，阅读过他写的大部分文章。当时，对我的这位“一文”师还是很佩服的。

在单位里找不着他。六四年，我随孔罗荪去丁香花园写批判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文章时，却又经常能够见到。

见了面，彼此也不招呼，更不对话。就跟陌生人似的。

丁香花园内，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边上有一条水泥铺的走道。工作之余，我常常会踩着从伙房偷偷弄出来的黄鱼车，在走道上兜着玩。一般人都以为，踩黄鱼车与踩自行车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把握黄鱼车的笼头与把握自行车笼头使的力有所不同。胡锡涛是骑自行车的能手，他见我这个骑自行车要有人在后面扶着的人，骑着黄鱼车悠游自在的样子，挺不服气的。他要和我比拼踩黄鱼车。

擂台摆起，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的人和写作班子的人都来助兴。姚文元当时也在场。这次比拼的结果是，胡锡涛踩着黄鱼车，一头撞到走道边的夹竹桃树丛里。夹竹桃的枝桠挑落了他戴着的眼镜。幸好，人没伤着。

此情此景，围观的人们惊惊咋咋的。唯独姚文元，视而不见似的，双手抱胸，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事后，我问胡锡涛，姚文元与他下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冷漠？不苟言笑？胡锡涛说，才不呢。输了棋，他会耍赖。

六五年，姚文元关起门来写《海罢》的文章，作为他的助手，罗思鼎小组办公就在武康路2号二楼，也是处于戒备森严的绝密状态。可能是为了来罗思鼎小组处查找资料，或者与他们一起研究文章上的事情，在此期间，姚文元曾到武康路2号来过多次。见到我，也跟不认识似的。每次来，都会留下到吃了午饭再走。姚文元衣着非常随便。吃饭似也极不讲究。武康路2号一天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机关食堂送来。一般情况，送饭师傅每次都会稍稍地多带几份饭菜。一方面让就餐者有点选择余地。一方面，万一来了客人，也可以应急。姚文元留下吃饭，从不要求通知食堂增加饭菜或带点好菜。到了吃饭时间，随便拿上一份，有坐就坐，没坐就站着。唏哩哗啦地吃了起来。碗里的饭菜倒是吃得干干净净的，但在他的嘴边、乃至衣襟上，都会留下不少的饭粒和菜汁。他一点不在意。挎上他的那只几乎永不离身的黄绿色军背包。招呼也不打一个，一走了之。

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之后，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一直是文革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喉舌。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篇篇都是政治任务。他的拘谨、极少与别人沟通，恐怕与他的工作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试想，与人交流，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没意思。而他撰写并发表评《海罢》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指挥，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等人一起参与过讨论，这些，他能说吗？当然不能。我有点同情他，他仿佛是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与别人沟通、只能自闭的境地之中。因为，他充当的是政治传声筒的角色。所以，对他的种种不近人情之处，也就只有理解两字而已。

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一起受中央文革指派来上海指导工作。他在武康路2号和张春桥一起会见了写作班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以后，单独留了下来。当时，正值晚餐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正好还剩余有两份冷饭、冷菜。他和罗思鼎小组的朱维铮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

六七年初的武康路2号，夸张点说，有点像列宁攻打冬宫前的斯莫尔尼宫。它是造反派们活动的中心。底楼、二楼办公室人来人往，乱哄哄的。罗思鼎小组的人把姚文元带上了三楼寝室。我也跟了上去。

姚文元就这样一边站着，饭粒、菜汁飞溅地吃着，一边与罗思鼎小组的人有说有笑。从认识姚文元以来，我是头一次看到他和周围的人有说有笑的样子。仔细打量这时的姚文元，一身戎装。军大衣披着。看上去，虽然并不显出英武，但以往的邋遢相是全然不见了。只有吃饭时的一副吃相，依稀还是当年模样。也依然不和我招呼，形同陌路。

徐景贤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份，回家多有不便。就把他的爱人金英接到武康路2号。于是，我的宿舍就成了他们夫妻鹊桥相会的地点了。我带着姚文元下楼到我的宿舍。他爱人金英已经在那里了。我不认识金英，姚文元也不给我介绍。

正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五十年代，姚文元的关系还在作协机关的时候，曾认购过500元公债券。一直存放在作协机关主管后勤的杨仁初那里。文革以后，单位里乱哄哄的。杨仁初怕万一丢失，对姚文元没个交代。便把这500元公债券交给了我。让我得便时转交给姚文元。

当我到楼下办公室里取了公债券返回宿舍的时候，房门依旧开着。只见夫妻俩相对而坐，刚才与罗思鼎又说又笑的姚文元又不见了。他对我去而复返，问也不问。我把公债券递到他手上，他随手往桌子上一放。我急了。500元，几乎相当于我大半年的工资。杨仁初把它托付

给我，我是有责任的。我说，你倒是放放好啊。姚文元用他那双水泡眼瞪了我一下。总算把公债券塞到军大衣的口袋里去了。

我转身替他关上了房门。我的宿舍，虽然在整幢楼房的一个角落。万一给人发现，我倒是什么都没有，姚文元岂不麻烦？

此时此刻，上海的造反派还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到了上海哩！

我与姚文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老实话，说不清楚。领导与被领导？不那么直接。我与他中间，隔着好几级阶梯呢。师生？我是这样想的，可他未必认同。朋友？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反革命团伙？岂非把毛泽东推到了反革命团伙头子的位置上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那末，为什么我们又时常会关联在一起呢？

从五九年起，在作协文艺思想批判会认识；

一起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辅导过我写文章；

一起在丁香花园，武康路2号文革前市委写作班共过事；

在他和张春桥的促使下，文革前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

造反后，武康路2号一度成为他和张春桥与上海各路造反英雄们的会所；

《朝霞》丛刊创刊号，送给上海市委所有领导人手一册，只有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看到《外国文艺摘译》以后，也只有他，提醒编者，每期刊物的前面，必须有导读文章，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所批判；

《朝霞》事件后，他对萧木说，正式任命我担任副主编，是否对工作更有利……

一直到后来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

不知道姚文元怎么看待这些关联。我觉得，无非是党内思想路线、派别斗争的需要罢了。只不过，他是车马炮，我是小卒子而已。

七六年五月，我在济南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后北上北京，原本是只去见张春桥的。不知为什么，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把我找了去。当时我猜想，多半是《朝霞》事件的关系。姚文元在《朝霞》事件之后，曾要萧木带信给徐景贤，要他认真地再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去掉一些私心。他这次把我找去，也许是对我在《朝霞》事件中的表现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在见过张春桥后的一天晚上，萧木把我从《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处。我曾一直以为姚文元和张春桥是在一起办公的。萧木告诉我，毛主席提醒王、张、江、姚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姚文元就主动搬出钓鱼台了。

也许因为是夜里的缘故，视觉有些模糊。姚文元的住处，像是一所过去京官们住的，有好几进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书接着我们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弯弯绕绕走了好些时候，才来到一间感觉大而无当的会议室。会议室只在进门的一头亮着灯。整个房间昏昏暗暗的。桌椅、墙壁看上去都非常陈旧。我们还没坐定，姚文元就进来了。

话题自然从济南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说起。姚文元自己也是鲁迅研究者。对这次会议似乎一直很关注。他说，周海婴（鲁迅之子）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在鲁迅的研究上，存在着否定一切的倾向。这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起因之一吧。

还说,《光明日报》的内参上,有你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观点是对的。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对了。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这个意思。

接着,讲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他说,当时,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景象。人头攒动,一点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那样的场面。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也是暴力。还是恩格斯说得对,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注)

从姚文元处出来,我问萧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萧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好几年了,都磨破了。没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Q了一件。

“四人帮”刚垮台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对林彪,一下子就恨起来了;对刘少奇,是恨了很久才恨起来;对邓小平,是怎么也恨不起来;对“四人帮”,则早就恨在心里了。我后来想,是不是办公厅的人在那时候就把姚文元恨上了?

回到住处,我把姚文元刚才说的那些话,尽可能地写了一点回忆笔记。我觉得,朱永嘉对我这次来北京的期望值是太高了。指望着我能多拔几根鸡毛,拿回去让他当令箭来使。其实,我心里明白,张、姚想见我,决不是要我去汇报工作。或是想通过我传达什么。既非汇报工作,又没有传达的义务。所以,在见他们的时候,没有做笔记。回到住所,趁着记忆犹新,记上几笔备忘。主要是回写作组对朱永嘉有个交待。

我是住在《红旗》杂志社用来接待来京写作或修改文章的作者的招待所里。与我大学时住的学生宿舍差不多。简陋得很。而且我住的这间房,房门正对着烧水的锅炉间。人来人往的十分嘈杂。

叫我更头痛的是,每当我见过张或姚的次日,胡锡涛都会到我的住处,软磨硬逼,要我透露一点“新的精神”给他。我是一句没有。为此,胡锡涛从此不再叫我的名字。就叫我阿庆嫂(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主角)。滴水不漏。我回敬他,叫他胡司令(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反角,草包司令胡传魁)。

胡锡涛是个满世界跑的人。从北京到上海,凡是见到熟人,就说我这个人不够朋友。是个绝情之人。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我也是个编辑,知道“上面的精神”对于编辑来说,确是至关重要。但,一则,实在是无“精神”可说,再则,即便有,按着我的个性,我也不会张扬的。

“四人帮”垮台以后,当《红旗》杂志社的清查小组要胡锡涛把七六年五月我去北京的事说说清楚的时候,他对姚汉荣说,当时,真是恨死了这个人。现在,感激涕零。阿庆嫂滴水不漏,还真是救了他一把。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的清查组都认为,七六年五月我去见张、姚,与七六年十月发生在上海的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有关联。如果当时,那怕我只跟他说上一句、两句,他就给搅到阴谋武装叛乱的事件中去了。倒一辈子霉去吧。

从北京回上海后,连家都没回,朱永嘉把我直接从机场接到写作组。等着现炒现卖。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办公室里除了朱永嘉、王知常、还有徐景贤,没有其他人。我根据自己的回忆笔记,把张、姚对我说的话,尽可能详尽地作了汇报。完后,我的记事手册就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所以,在“四人帮”垮台前,除了前面说的三人,再加上萧木(在北京与王、张、



姚见面的事，都由萧木安排并陪同）。没有向任何人再说过此事。包括我的丈夫张春生。

在认识姚文元这长长的十几年里，他总和我说过几句话，屈指可数。而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我在他那里待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小时，他对我说的话，却是比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在我见到的三个人中，他也是说话最多的一个。

张春桥是听我说，只是表露出他很愿意听的样子。

王洪文，则是话没有说上几句，就忙着吃喝玩乐。之所以见我，恐怕是做给张春桥看的。

从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派，联袂回上海指导工作，并且，从此以后，凡是公开场合，有姚必有张，有张必有姚。像个连体人似的。这种现象，在从古到今的官场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而且，在我心目中，姚文元和张春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因此，一直以来，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总是挥之不去。他们之间的联合是一个怎样的联合？也许因为姚文元是个文人，而张春桥是个政人。文人要有所依附，政人要有所宣扬，互相需要罢了。但从姚文元和我的谈话中，使我感到，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姚文元和许多文人一样，对权力的兴趣，不及对文章的兴趣。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种种理论，从老祖宗们的经典中来，然后运用到他所写的文章中去。写得头头是道，而在实际的权力场中，却是一个没有实践能力，或许，是个不想去争去抢的权力盲。所以张春桥能够与之联合。

姚文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书呆子。

注：

一九八〇年底，我从看守所出来，被安排在市印刷六厂包装车间劳动已经一年多了。忽然有一天，宣传部负责与我联系的人通知我，收拾行李去北京。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案即将开庭审理的事已有耳闻。把我叫去，自然是陪“四人帮”接受审判。家里的人有些紧张。我倒还好，死猪不怕烫。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吧。与我同机前去北京的人中，我认识的就一个，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到达以后，何秀文就与我分开了。听说，他去了部队的招待所。我被安排在西苑宾馆。

巧了。一九六〇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海代表团的住地，就在这西苑宾馆。物是人非。昔日的堂上客，今日已是阶下囚了。

我住在宾馆底层浴室对门一间可能是临时拾掇出来的房间里。电灯、电话俱全。洗澡就在对门。行动是自由的。

至此，我还不知道叫我来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过了一、二天，可能是检察院的人，通知我，要我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指证姚文元。指证他是如何通过我的谈话为上海武装叛乱出谋划策的罪行。

莫名其妙。

“四人帮”垮台以后，关于七六年五月姚文元与我谈话的这件事，毫不夸张地说，交代过不下几十次。但我敢肯定地说，没有一次是把姚文元的这次谈话与上海的武装叛乱相联系的。检察院的这一事实从何而来？而且，在通知我作证之前，既没有问过我愿不愿作证，也没有向

我这个证人核实证词。这个被誉之为世界瞩目的审判，在这些细节之处，也太不讲究司法程序了吧？

虽然，我是“四人帮”一案的涉案人员。但对这次审判，和许多人一样，寄以厚望。一方面，通过司法介入来解决共产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史无前例。感到新鲜。还有点莫名的兴奋。毕竟，此举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想到要法治了。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审判，能解开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心结，“四人帮”究竟是怎样阴谋篡党夺权的。

现在倒好，要我为姚文元这一子虚乌有的罪行出庭作证。说有，是伪证。说没有，是拒不作证。这不里外不是人吗？

思之再三，我给有关方面写了一份思想汇报。提出了我对要我指证姚文元这件事情的看法。其一，姚文元在我七六年五月去北京见他时，的确对我说过，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但他同时还说，这是恩格斯说的。他是用恩格斯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来看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一句套话而已。其二，姚文元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七六年五月的北京。我回上海向写作组领导朱永嘉汇报，也是在七六年五月份。而上海的武装叛乱，发生在七六年十月份。姚文元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思想汇报交出去以后，过了几天，来了许多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的。像是主持与我见面的人（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既不自报家门，也没人向我介绍。我不知该怎么称呼）说，我的书面意见，有关方面知道了。他们之所以今天来找我，是要我当着他们的面，再次阐明一下自己的想法。这有何难。思想汇报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说了。并且，再三声明，我不是拒绝作证。只是从这次世人瞩目的审判，怎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角度来考虑的。

坦白地说，如果一定要我上法庭作证，那末，到了法庭上，非但不是指证，反过来为姚文元辩解的事，我也不是做不出来。但我不是一个奸刁之徒。遇事当面敷衍，临了来个突然袭击。这种有悖于为人之道的事，我也决不会做的。我想这满屋子的人中，总会有几个明白人在里面吧？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这次审判“四人帮”的事。司法介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无前例。是个进步。但是，也许正因其没有先例，看上去总有些走样的感觉。

证人出庭作证，本是检察部门的事。可是，通知我来北京的，是上海市委宣传部。这又是那一出？证人的证词，未经核实，就要求其出庭作证。有这样的规矩吗？还有，检察部门是从哪儿取的证？从证人的交代材料中？我从未有过姚文元七六年五月与我的谈话和七六年十月上海发生的“武装叛乱”有关联的交代。那末，是从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的交代材料中？也就是说，从张三或李四那里取证，叫王二麻子出庭作证。闹到最后，还不是事实。

司法的严肃性何在？

这次开庭审判“四人帮”一案的时候，有关方面一再强调、反复重申：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就交给历史检验去吧！

□ 节录自《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  
~~~~~

【往事追忆】

## 批邓和“四·五”事件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 我也保过“老邓”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鞠躬尽瘁，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悲声一片，十里长街哭送总理，那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日子。

不久，已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又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大刮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邓小平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刘少奇最后被开除党籍，迫害致死，邓小平是“发配充军”江西，但一直保留党籍，等到了“解放”并重新“出山”。在文革中被打倒受批判的日子里，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和形势的压力，邓小平曾经给毛泽东和中央写过“诚恳”的检查，并表示“永不翻案”，愿意到图书馆当资料管理员等等。中央把邓小平的检查向全党全国公布，邓小平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全党、全国人民的谅解，得以重新上台。这些故事“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回避。

我当时的认识是，邓小平上台后，实事求是地审时度势，抛开个人得失，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发表了几次“拨乱反正”的讲话，开始逐步否定文革中的错误，（注：当时老邓还没有全盘否定文革。）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贵就在于“无私”和“为公”。至于“永不翻案”之类的话，那不过是政治家的文字游戏，压根儿就不算数的。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该翻的案就要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毛泽东说话‘句句是真理’，我邓小平可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啊！”

自从抓完“5·16”以后，我在738厂劳动改造，打扫卫生。活很轻，扫完两个又臭又脏的厕所，把垃圾运到垃圾场就完事了。每天下午我都骑自行车进城玩或找同学侃大山，当然少不了议论朝政的事。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注：文革中北航红旗没有直接反对邓小平，更谈不上迫害了。）

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738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他看了后也说很好，但不几天，738厂党委保卫部刁部长就找我去谈话。

“戴维堤，你还不老实？你竟然又吹捧起邓小平来了。邓小平是什么人？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比蒋介石还坏，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保卫部长瞪着眼逼问我，“你唯恐我们厂不乱吗？”

这个刁部长抓“5·16”时拍军管会的马屁整得我好苦，我对他没有好感。我没好气地

对他说：“从哪儿弄来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我只能说是在公共汽车上捡的。我现在已经扫地劳改了，你还能把我再怎么样吧！”

“你这个态度，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必须把吹捧邓小平的言论和‘三株大毒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出检查，听候组织处理。你不要认为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了。从今天起，党委决定，你白天上班不准离开厂子，不准到社会上去串联，否则后果自负。”

“这点我做不到。我打扫完厕所后浑身臭烘烘的，到你办公室去坐着？有本事你再把我关起来！”

他气得直拍桌子，最后不欢而散。从此以后，厂里对我的“内控”更严了。

我当时拥护邓小平，完全是出自公心和不计个人恩怨，这比某些既得利益者保邓小平似乎略高一筹。文革初小平同志派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整的好苦。我们对小平等人有埋怨情绪，这是事实，我们毫不隐瞒。但是，埋怨小平是个人小事，拥护老邓是大政方针，二者是对立统一，不矛盾。我们不是“四人帮”的爪牙，我们没沾“四人帮”一点光，我们凭什么去保“四人帮”而反邓小平？况且，做人以服从真理为俊杰。邓小平尽管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有错误，但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毛泽东主席已经重新重用了他，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们凭什么还揪住老邓的小辫子不放？（注：小平同志曾笑谈他是维吾尔族小姑娘，小辫子很多。）邓小平是老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理论和办法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开个人恩怨拥护邓小平？这就是当年笔者——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真实思想和行动。当然，万分遗憾的是，当时小平同志信息不灵（怪我们自己不爱张扬），不但不知道我辈拥护他、保他，反而后来又利用抓“三种人”狠狠地整了我们一家伙，使我辈至今对他老人家（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还有陈云等老人家）有埋怨情绪。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也！不过没关系，当时保老邓至今不悔，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 ◇ “四·五”事件亲历记

1976年清明节前夕，北京市某些人下了禁令，不准去天安门送花圈。“四人帮”之流预感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会不太平静。

为了表达我对周总理的热爱和怀念之情，4月4日，我在自己的斗室里偷着做了一个花圈，趁早上人少的时候，用自行车驮着，从酒仙桥抄小道进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把花圈安放在离纪念碑不远的地方。

我的花圈当时是广场上第八个花圈。

很快，天安门广场便成了花圈的海洋，最大的花圈象卡车一样大，是用钢铁焊成的。许多花圈上都有挽联、诗词，内容除了怀念周总理外，许多都是矛头指向“四人帮”的。有一悼词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问总理，是拆还是烧……有的人发表慷慨激昂地讲话，指名道姓地怒斥“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民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无数的人们穿行、徘徊在花圈的海洋里。有人凝视，有人流泪，有人哭泣。那个场面，那种气氛，实在催人泪下。我当时想，就算世界上的反共分子，只要他还是个人，置身于那种环境和气氛下，他也会受感动。

我给总理送的花圈上没有写任何诗词和语言，我的心意用花圈代替了。但在这种气氛中，我还是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写几首小诗挂在花圈上。

历史上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皆有其明显的原因，这就是人民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文革以来，毛泽东重用的林彪、“四人帮”等人搞乱了国家，失去了民心，搞得天怒人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我等文革初期狂热地追随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也被现实和事实教育了过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和毛泽东的初衷大相径庭，变成了一场灾难。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连为他们卖命的人，“四人帮”之流也不放过，也要变着法整我们。把我们一脚踢开也就完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作为造反派，我们也恨死了“四人帮”。

笔者认为，“四人帮”的最大失策之一，是不该反总理。总理这个人，总以大局为重，不到万不得已，他老人家总是“和为贵”的。鉴于总理的地位和威望，以及他对毛泽东的忠心和文革路线的支持（这点是事实），如果团结好总理，“四人帮”最后很可能会成就“大业”，起码最后不会被抓起来。抛开是非不谈，按政治斗争的常识，“四人帮”不该多路出击，四面树敌。他们明明知道，总理是打不倒的。他们自己的资历、威望、能力和势力皆没法和总理比。如果不是利令智昏的野心家，稍有政治斗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中国绝对不应反总理。“四人帮”这几只狐狸先天不足而又利令智昏，他们只知道“狐假虎威”，利用毛泽东的威风去唬人、整人，而不知道利用周恩来的威望去团结人、笼络人，这就注定了他们要丧失民心，自取灭亡。“四人帮”另一个最大失策是利用抓“5·16”把造反派们全打下去了，连我这样的人也被他们推向了反面。仍然抛开是非不谈，“四人帮”这一手绝对是犯了政治家的大忌，太没水平。两军相斗，哪有先把自己的炮灰们先杀光了的呢？这是起码的常识。“四人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只要有毛泽东支持就可以成大业，不懂得群众和民心的重要性。“四人帮”没打过仗，不懂得没有战士、没有“炮灰”，光杆司令纵有天大的本事，只能当俘虏。我真奇怪，“四人帮”们智商都不低，为什么连这种小学生的水平都没有呢？这就叫利令智昏。难怪后来连邓小平都嘲笑说，“四人帮”搞政治斗争是小学生辈的。

果然，“4·5”事件中，几乎没有一个造反派出来保“四人帮”，相反，大部分“造反派”却加入了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列。失人心者失天下，“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他们就是这个水平。可悲的是，晚年的毛泽东固执己见，战略失误，看人不准，用人不当。面对文革的险境甚至绝境，不但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直到把弓弦拉断也不回头，最后搞得引火烧身，几乎毁了自己一生的英名。

每一个大事件都有导火索。“四·五”事件的导火索还需从《文汇报》谈起。这张上海“四人帮”的爪牙们控制的报纸于3月25日发表了一篇《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奇文，文中有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知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不知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谁能把邓小平扶上台？除了毛泽东，似乎只有周恩来。《文汇报》的秀才们同样利令智昏，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当时的中国，毛泽东还活着，没有他的同意，周恩来是不可能把邓小平扶上台的。这只能暴露了他们反周恩来总理的嘴脸。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国人。周总理尸骨未寒，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泪迹未干，上海《文汇报》公开向国民挑衅，首先惹火了北京人。天安门广场里声讨《文汇报》和“四人帮”的口号声、讲演声、悼念总理的哭泣声响成一片。

广场上人越来越多。据后来估计，4月4日这天，先后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约有二百多万。

愚蠢之极的“四人帮”及华国锋、吴德等人一反毛泽东的“相信人民群众”、“人民万岁”的信条，上违天意，下欺民心，要逆流而动。（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头脑“清醒”，亲自派人在天安门广场观察，听取汇报后大发雷霆，并亲自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早在4月2号，“四人帮”就指使公安部长华国锋、北京市长吴德调集警察，卫戍部队和首都民兵，组成了“联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里。从各工厂抽调来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三千多人及卫戍部队随时准备出动。

4月5日这天一早，我又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一看，昨天花圈的海洋没有了，广场上一片狼籍。原来，4日晚上，广播了吴德讲话，北京市出动了二百多辆大卡车把花圈拉到八宝山烧了，并抓了一些保卫花圈的群众。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人们高喊着口号，拥向了大会堂附近。这时，我看见人们围着一个说总理是走资派的家伙在打。还有几个说总理坏话的人跑进人民大会堂躲起来了。

继续要来送花圈的人很多，都被民兵、警察和当兵的拦住，不让进广场。这时广场里已有数十万群众，东西长安街上许多群众们向广场进发。一辆广播车在广场四周一边开，一边喊：“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同志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离开天安门广场！”持广播喇叭的是个警察。有的群众骂他，他以牙还牙。这时一些群众忽地围了上去，夺过他的喇叭，并把广播车掀翻了。

大会堂东门外人山人海，水泻不通。警卫大会堂的卫戍部队战士同愤怒的人们发生了冲突。人们指着解放军战士质问：“你热爱不热爱周总理？不热爱回家种地去！”战士眼里含着泪，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中午时，人群包围了广场东南角的“联合指挥部”小楼，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时一辆指挥部的上海轿车被群众点着了，顿时浓烟冲天，掌声、叫好声一片。

下午，又有好几辆汽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傍晚的时候，广场上的广播喇叭突然一齐响了起来，三番五次地广播说现在有别有用心的人和坏人捣乱，要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广场，广场要戒严，谁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

我预感到要出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随大部分人离开了广场，躲到了南池子附近。这时只见卫戍区的部队和警察、民兵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开来。

镇压开始了。来不及跑的人们被一棒子一个打倒在地。叫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打手们把被打昏了的群众从广场上象拖死狗一样一个个地堆在了路边的松墙后面。有的人晕过去了，有的人头破了，有的人腿断了，不一会儿，他们被扔上汽车拉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水泥方砖上，到处留下了一滩滩血迹……

以上就是我亲自经历的“四·五事件”。

“4·5”事件中，被抓被关的人民群众三百多人，被打伤的人不计其数，被审查的人成千上万。事后据官方说，没有死人。

共产党建国执政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老百姓山呼万岁的地方，是无比神圣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吐痰，没有人敢骂人、打人，甚至小偷也不敢在这里偷东西。文革十年来，无数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这里集会、游行、呼口号、喊万岁，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撒野，更不要说打人、杀人了。

“4·5”事件，是共产党执政27年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次流血事件，也是共产党执政当局第一次在这里打人、抓人，镇压人民群众。笔者孤陋寡闻，追溯上一次在这里对老百姓大打出手的可能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有一有二就有三，下一次不知道轮到谁！

后来，我编了一段顺口溜，送给“4·5”事件的打手们：

谁说我是秀才？  
我杀人会用笔杆子。  
谁说我只会动笔？  
我打人会用木棒子。  
那棒子打在头上，  
冒出一滩血迹。  
那是反革命的血，  
多流一点没关系。

谁说我是女人？  
老娘会歇斯底里。  
我的手没有力气，  
从不敢杀一只鸡。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的纤纤玉手上，  
全是看不见的血迹。

谁说我只打蒋介石？  
对“暴徒”我也不客气。  
学生、工人怎么啦？  
就看你老实不老实。  
手无寸铁没有关系，  
老子照样“揍扁”了你！

杀人就要偿命，  
欠债要付利息。  
总有一天，  
历史会惩罚你们，  
封建法西斯！

“4·5”事件第二天，我又被传到了738厂保卫部。

“戴维堤，你去天安门广场了没有？”刁部长拍着桌子问道。

“我没去。那是是非之地，本人不去。”

“有人看见你去送花圈了！”

“送花圈又怎么啦！我给总理送花圈，我热爱总理，这也有罪？”

“上级不准送花圈，你不知道？全厂这么多人都没送花圈，难道都不热爱总理？就你热爱总理？我看你是本性难移，不闹点事不舒服。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花圈上写什么了没有？”

保卫部长今天实在岂有此理！我顿时火冒三丈。

“姓刁的，你少来这一套！你说我是什么人？我再坏也没有你坏。你什么时候都一贯正确，文革初出卖、批斗老干部你干过没有？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坐车不买票让人抓着的主儿，你认为我不知道？”

保卫部长的鼻子气歪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把保卫部的门用力一摔，扭头走了。

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4月5日前后，738厂也有许多人去了天安门广场，确有人写了所谓“反动诗词”，上面一个劲地追查。“四人帮”派特务们录了相，照了象，按照照片追查凶手，幸亏我送的花圈上没留“罪证”。厂里一位工人因天安门事件被整得在厂内车间里自焚，差点烧死。可喜的是，738厂党委中有好人，他们怕引火烧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当基层领导有很多学问，既要会俯首听命，又要会欺上瞒下；既要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要会无中生有，小题大作，捞取政治资本，关键看你的良心和水平。

伟大的“4·5”运动，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很快就应验了。

“4·5”事件，最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

“4·5”事件为邓小平的复出奠定了基础、尽管“4·5”之后邓小平立即又被打倒。

“4·5”事件为华国锋、吴德等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这种资本很快就变成了罪状。

“4·5”事件使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龙颜大怒并受到极大的震撼。如果说林彪事件是中央内部对他的挑战，那“4·5”事件则是来自民间的“造反”。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口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民群众突然变成了痛骂“昏君”的“刁民”，这真是“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他老人家至死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林彪叛逃和“4·5”事件象两个催命符，很快把毛泽东推向了生命的尽头。

俗话说，天意不可违，民意不可欺。1976年的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天怒人怨。随着周总理的逝世，“4·5”事件的爆发，更大的灾难正在孕育之中，伴随着这场灾难发生，毛泽东、朱德二颗巨星骤然陨落了。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